

抗戰烽火中的
中國大學

陳平原
著



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
www.hkopenpage.com

目錄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緒言：炸彈下長大的中國大學 | 8 |
| 此情可待成追憶——中國大學內遷的歷史、傳說與精神 | 23 |
| 一、炸不垮的中國大學 | 24 |
| 二、一九四一年的統計 | 31 |
| 三、不該被埋沒的文本 | 39 |
| 四、筆落如何「驚風雨」 | 52 |
| 五、「奇跡」該怎樣講述 | 69 |
| 永遠的「笳吹弦誦」——關於西南聯大的歷史、追憶及闡釋 | 101 |
| 一、戰火摧不垮中國大學 | 103 |
| 二、「光榮」不僅屬於西南聯大 | 111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三、必勝信念、學術關懷以及師生情誼 | 118 |
| 四、以本科教學為中心 | 132 |
| 五、「人和」的另一面 | 141 |
| 六、「應叫青史有專篇」 | 151 |
| 豈止詩句記飄蓬——抗戰中西南聯大教授的舊體詩作 | 165 |
| 一、漂泊西南多唱酬 | 170 |
| 二、百一篇成聊自遣 | 180 |
| 三、詩史更愧無君才 | 191 |
| 四、還將孤憤託長吟 | 199 |
| 六位師長和一所大學——我所知道的西南聯大 | 215 |
| 一、從「宏大敘事」到「私人記憶」 | 216 |
| 二、師生之情與「同窗之誼」 | 219 |
| 三、「新文學」教學之披荊斬棘 | 224 |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四、湘黔滇旅行團的故事 | 230 |
| 五、政治與學術的糾葛 | 234 |
| 六、物質與精神之張力 | 239 |
| 後記 | 247 |
| 參考書目 | 252 |

緒言：炸彈下長大的中國大學

「連天烽火」與「遍地弦歌」，這本是兩種截然對立的情景，而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，二者竟巧妙地相互配合，交織成撼人心魄的樂章。我曾不止一次推薦加拿大學者曼古埃爾所撰《閱讀史》中的一幅照片^①：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二日倫敦遭德軍轟炸，很多房子倒塌了，這間西倫敦荷蘭屋圖書館，牆壁也已傾頹，地下滿是磚石，竟然有人不顧敵機剛剛離去，又在書架前翻檢自己喜愛的圖書。我說：這固然是對抗厄運，堅信未來，但也不妨解讀為：「閱讀」已經成為必要的日常生活，成為生命存在的標誌^②。後來，我終於找到一幅可與之媲美的老照片，那是西南聯大教授朱自清、羅庸、羅常培、聞一多、王力的合影——我故意略去拍照的具體時間及地點，以便將其作為抗戰中意氣風發的中國讀書人的象徵。在一次專題演講

① 阿爾維托·曼古埃爾著、吳昌傑譯：《閱讀史》第三七〇—三七二頁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二〇〇二年。

② 參見陳平原《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「讀書」》，《文匯報》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；《讀書的「風景」與「愛美的」學問》，《光明日報》二〇〇九年八月二十日。

中，我提及這幅照片：「聯大有甚麼值得驕傲的？聯大有精神：政治情懷、社會承擔、學術抱負、遠大志向。聯大人貧困，可人不猥瑣，甚至可以說『器宇軒昂』，他們的自信、剛毅與聰慧，全都寫在臉上——這是我閱讀西南聯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。」^①今天的中國大學，從校園建築到科研成果，都正朝「世界一流」飛奔，但再也找不出如此明亮、乾淨與自信的合影——那是一種由內而外、充溢於天地間的精神力量。

戰火紛飛中，中國大學頑強地生存、抗爭、發展，其中蘊涵着某種讓後人肅然起敬的神秘的力量。歷朝歷代，凡狼煙四起時，最容易遭受毀滅性打擊的便是手無寸鐵的師生及學校；只有當戰亂平息，統治者才有心思在滿目瘡痍的廢墟上重建教育。借用建安八年（二〇三年）曹操所下《修學令》：「喪亂以來，十有五年，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，吾甚傷之。其令郡國各修文學。縣滿五百戶置校官，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。庶幾先王之道不廢，而有以益於天下。」中國歷史上幾次影響重大的衣冠南渡，就其實際效果而言，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教育、文化及科技的轉移，但從未有過在戰爭中為保存文化而有計劃、成建制、大規模地撤退學校的壯舉。抗戰中中國大學之所以沒被炸垮，還能弦歌不輟，乃中央政府、後方

① 參見《陳平原：尋找二十一世紀中國的「大學之道」》（俞熙娜整理），《錢江晚報》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第十四、十五版。

民眾以及大學師生共同努力的結果。

如此扣人心弦的故事，古代中國從來沒有，同時期歐美各國也談不上——那是因為，美國遠在天邊，不太受戰火影響；英國雖被轟炸，國土未被入侵；法國全境被佔領，大學無處可遷；唯有前蘇聯，在衛國戰爭中同樣存在大學內遷的現象。只是因各大學在外流徙時間不長（以莫斯科大學為例，一九四一年十月遷離危城，一九四三年春勝利回歸），沒能像西南聯大等中國大學那樣，不但未被戰火摧毀，還在發展壯大的同時，催生出眾多美好的「故事」與「傳說」。

談及西南聯大等內遷大學的貢獻，容易說的，是有形的，如培養人才、推動科研以及投身戰場；不太好說的，是無形的，那就是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，如何凸顯某種高貴的精神氣質。具體說來，硝煙瀰漫中，眾多大學師生之弦歌不輟，這本身就是一種穩定人心的力量。抗戰中，大批中國大學內遷，其意義怎麼估計也不過分——保存學術實力，賡續文化命脈，培養急需人才，開拓內陸空間，更重要的是，表達了一種民族精神以及抗戰必勝的堅強信念。而在中國大學日漸富有、也日漸世俗化的今日，談論那些已經隱入歷史深處的、「破破爛爛但卻精神抖擻」的西南聯大等，也算是「別有幽懷」。

我曾提及：「跟專業的教育史家不同，我的研究帶有明顯的問題意識，首先是解決自己心

中的困惑，而後才是史學價值的追求。不過，一旦進入具體課題的實際操作，我還是努力保持史家實事求是、多聞闕疑的風格。我說過，在中國，爭辯教育得失，不專屬於教育家和教育史家，而是每個知識分子都必須承擔的權利與義務。我已出版的幾本小書，大體上都是實踐這一諾言，即便不夠專業，起碼也是認真思考的產物。」^①因專業背景的關係，我談晚清至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中國大學，最為拿手當行；其次便是對於當下中國教育改革大潮的評論——思考不見得周全，但洞見還是有的。至於中間這一大塊，我之選擇「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」，是希望兼及史學研究與現實關懷。

說起來，關於「戰爭中的大學」這個題目，我醞釀了好長時間，只是多為演說或短論，不太能端上台面，只好任其散落各處。

記得我最早談論這個問題，是一九九七年一月為北京大學出版社重刊《中古文學史論》所撰跋語，其中提及：「南渡的感時傷世、魏晉的流風餘韻，配上嵇阮的師心使氣，很容易使得感慨遙深的學子們選擇『玄學與清談』。四十年代之所以出現不少關於魏晉南北朝的優秀著述，當與此『天時』『地利』不無關聯。」^②對於西南聯大乃至所有內遷大學的教授及學生來說，

① 陳平原：《我的「大學研究」之路——代自敘》，《大學有精神》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二〇〇九年。

② 參見王瑤《中古文學史論》第四四〇—四四五頁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一九八八年。

「南渡」既是學術對象，也是文化氛圍，更是精神傳統——時至今日，我仍堅持這一發現。另外，談內遷大學的教學及科研，既充分肯定其業績，也不盲目拔高，理解各專業領域所受戰爭的影響不同，體貼學者們是如何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。如此觀察與評論，兼及政治史、學術史與教育史，使得我談抗戰中的中國大學，可與此前此後的大學史論述血脈相連。

三年後，我發表題為《過去的大學》的短文，談西南聯大極為嚴苛的圖書借閱制度，以及教授會在動蕩年代所發揮的作用。前者是為了渲染大學的艱難處境，後者則凸顯聯大如何「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，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」^①。但撰寫此文的主要目的，是推介六卷本的《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》（北京大學、清華大學、南開大學、雲南師範大學編，昆明：雲南教育出版社，一九九八年十月）。而對我本人來說，從中得到的最大好處是，熟悉西南聯大這些瑣碎碎的檔案資料，必要時可以手到擒來。

又過了兩年，我在《中華讀書報》上發表《吳宏聰與西南聯大的故事——吳宏聰先生的〈向母校告別〉及相關照片》^②，文章引述了我在中山大學讀碩士期間的指導教授吳宏聰先生的來信

^① 參見陳平原《過去的大學》，《新民晚報》二〇〇〇年七月十六日。

^② 參見陳平原《吳宏聰與西南聯大的故事——吳宏聰先生的〈向母校告別〉及相關照片》，《中華讀書報》二〇〇二年七月十日。

及文章，討論西南聯大的學術品格。吳先生乃西南聯大中文系助教，此前幾年曾贈我精心保存的離開昆明前全系師生的合影；這回又專門撰文回憶那天拍照的情景，實在難得。此拍攝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的「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中國文學系全體師生合影」，以及吳先生所描述的拍照前後的故事，是我每回演講中國大學內遷歷史時都要演示的。

可我真正認真對待此話題，是從二〇〇七年開始。那一年，因參加宗璞先生從事文學創作六十週年座談會，我發表《小說家眼中的西南聯大》，談及藉文學作品了解西南聯大，最值得推薦的是鹿橋的長篇小說《未央歌》、汪曾祺的系列散文（如《泡茶館》《跑警報》《沈從文先生西南聯大》《西南聯大中文系》《翠湖心影》等），以及宗璞的《野葫蘆引》。帶有總論性質的，是以下這段話：「鹿橋的小說側重『青春想像』，汪曾祺的散文則更多『文人情趣』，宗璞呢，我以為頗具『史家意識』，其系列長篇立意高遠，氣魄宏大。」^①系列長篇小說《野葫蘆引》那時僅出版了前兩卷（《南渡記》，一九八八年；《東藏記》，二〇〇一年），我預言，倘若計劃中的《西征記》《北歸記》能順利完成，並保持前兩卷的水準，那麼，宗璞作為小說家的地位將大為提升，其在文學史上的既定評價也勢必改觀。

① 陳平原：《小說家眼中的西南聯大》，《新京報》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七日，以及《群言》二〇〇七年十二期。

約略與此同時，中山大學為中文系老系主任、西南聯大校友吳宏聰先生做九十大壽，我提前撰寫了長文《六位師長和一所大學——我所知道的西南聯大》，請《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》及時刊出，且送到了祝壽會場。此文主要談論吳宏聰、王瑤、季鎮淮是如何飽含深情地追憶他們各自的導師楊振聲、朱自清、聞一多，並藉此呈現他們對西南聯大的想像的^①。

那年的十二月十五日，我在浙江人文大講堂做題為《教育史上的奇跡——西南聯大的意義》的專題演講，現場效果很好，《錢江晚報》記者據錄音整理，以《陳平原：尋找二十一世紀中國的「大學之道」》為題，初刊《錢江晚報》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第十四、十五版。雖然日後收入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《大學有精神》時，我改回了原來的題目，但我承認，「尋找二十一世紀中國的『大學之道』」，確實是那次演講「壓在紙背的心情」。此報道摘錄了我演講的四個片段，分別是「留下了『讀書種子』」、「聯大人勝在『心態』」、「全力培養本科生」以及「今天我不想談校長」，另外一半篇幅則留給了現場問答，因此顯得很有現實針對性。

其實，那年四月，春暖花開時節，我還在雲南大學做了題為《此情可待成追憶——關於大

^① 陳平原：《六位師長和一所大學——我所知道的西南聯大》，《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》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二日。

學生生活的追懷與敘述》的專題演說，涉及西南聯大處，我引證了馮友蘭的自述、吳宓的日記、汪曾祺的散文、宗璞的小說，還有四位老學生的回憶錄——楊振寧的《讀書教學四十年》、何炳棣的《讀史閱世六十年》、許淵沖的《追憶似水年華》以及何兆武的《上學記》等。只不過這篇初刊《學園》創刊號（昆明：雲南人民出版社，二〇〇八年一月）的演講稿，着重點在如何追懷大學生活，兼及昆明的西南聯大、香港的新亞書院以及英國的劍橋大學，現場效果雖不錯，但體例駁雜，我不滿意，故從未收入自家集子。

第二年深秋，參加日本學者木山英雄《北京苦住庵記——日中戰爭時代的周作人》中譯本出版座談會，迫使我從另一個角度思考問題，那就是怎麼看待抗戰中淪陷區的政治及文化生態，以及如何談論類似周作人這樣的「落水文人」。在《燕山柳色太淒迷》一文結尾處，我談及讀《北京苦住庵記》的感想：「對於生活在太平歲月的讀書人來說，面對亂世中的『文人落水』，首先是哀矜勿喜，千萬不要有道德優越感。其次，不管是譏諷 / 批判，還是理解 / 同情，談論此類錯綜複雜的歷史場景及人物，分寸感很重要，即所謂『過猶不及』是也。作為史家，必須堅守自家立場，既不高自標榜，也不隨風搖蕩，更不能一味追求文章之『酣暢淋漓』。有時候，論者之所以小心翼翼、左顧右盼，文章之所以欲言又止、曲折迴環，不是缺乏

定見，而是希望盡可能地體貼對象。」^① 如此有感而發，因為那段時間，我正關注「偽北京大學」、「偽中央大學」以及淪陷區讀書人的精神狀態。既堅守自家立場，又保持必要的張力，這種論述姿態，使得我在辨析教授們離開北平時的「毅然」與「茫然」，以及在民族大義與個人處境之間的痛苦掙扎，有較為真切的感受與體悟。

我之談論抗戰中的中國大學，至此方才正式上路。此前乃隨意點染，算不上專業研究，故不收入本書。唯一的例外是《六位師長和一所大學——我所知道的西南聯大》，因可見最初的研究思路及感懷，故特意保留。

以下介紹各章的大致思路：

第一章《此情可待成追憶——中國大學內遷的歷史、傳說與精神》（初刊《澳門理工學報》二〇一五年二期）醞釀很早，定稿卻在最後。講述抗戰中中國大學內遷這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，事後回憶與學者發掘固然重要，但更值得關注的是當事人當年的文字，看他們如何在驚魂未定之際回首往事，製造傳說，總結經驗，暢想未來——那既是文學，也是歷史，更是精神。此文藉一九四一年《教育雜誌》的「抗戰以來的高等教育專號」《戰時全國各大學鳥瞰》

① 陳平原：《燕山柳色太淒迷——讀木山英雄〈北京苦住庵記〉》，《讀書》二〇〇八年十二月。

一書以及《解放日報》所刊《抗戰後專科以上學校集中區域》，勾勒各大學的遷移路綫、地理分佈以及辦學特色。另外，選擇二十篇或年輕學生或大學校長的文章，縱橫交錯，呈現戰時中國大學的精神風貌。文章最後討論如何跨越虛構寫實的鴻溝，讓日漸遙遠的「老大學的故事」重新煥發光彩。

第二章《永遠的「笳吹弦誦」——關於西南聯大的歷史、追憶及闡釋》（初刊台灣《政大中文學報》第十六期，二〇一一年十二月）試圖從教育史、學術史、思想史、文化史乃至政治史等不同角度入手，重新發掘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歷史、傳說與精神。於顛簸流離中弦歌不輟，此乃當年中國大學的共同生態，可後人談論抗戰中的學術文化建設，為何多以西南聯大為例證？除了三校合一學術實力超強，更因牽涉「故事」的誕生與傳播機制。而對於這所明星大學，近年學界及媒體多有高唱讚歌的，本文之強調「必勝信念、學術關懷以及師生情誼」，凸顯「以本科教學為中心」、辨析「人和」的另一面，自信有不少精彩的發現。

與前兩章之歷經多次演講的打磨不同，第三章《豈止詩句記飄蓬——抗戰中西南聯大教授的舊體詩作》（初刊《北京大學學報》二〇一四年六期）卻是一氣呵成。陳寅恪、吳宓、朱自清、潘光旦、浦薛鳳、魏建功、浦江清、蕭滌非等八位西南聯大教授，抗戰期間多有舊體詩創作，當初很少公開發表。他們的相互唱酬不只是因為共同的文學興趣，感情交流與相互慰

藉或是更重要的因素，注重的是友情、修養與趣味。八位教授學術背景各不相同，之所以都選擇舊體詩，既確認其文化身份，讓作者得以思接千古，又可以藉助韻語，表達某些幽微的思緒以及不合時宜的感覺，指向的是個人修養、歷史意識與文化情懷。這些「有情」且「鮮活」的史料，讓我們得以了解他們在戰火中的遭遇與思考、困惑與怨懟，以及壓在著述背後的心情。

第四章《六位師長和一所大學——我所知道的西南聯大》體例上有點特別，如此「公私兼顧」，既談我的導師，也談導師的導師，希望在三代師生的視野交匯處，凸顯一所大學所曾經擁有的英姿。如此設計，作為單篇文章沒有問題，收入本書則略嫌鬆散。當初之所以拋開大路，另辟蹊徑，選擇「限制敘事」策略，最大的理由是，對於像我這樣喜歡玩味細節的讀者來說，這樣寫顯得更親近，更可信，也更有人情味。

為了凸顯大思路，本書刪繁就簡，就選這四篇互相交叉，略有重疊，可以對照閱讀的大文章。其工作目標是，藉助檔案、報道、日記、書信、散文、雜感、詩詞、著作等不同史料的仔細辨析，跨越虛構與寫實的鴻溝，讓日漸遙遠的「大學精神」重新煥發光彩，也讓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」的大丈夫形象重新站立起來。

這既是世界教育史上一段異彩紛呈的華章，也是中華民族復興路上一座昂然屹立的豐

碑，講述如此波瀾壯闊的故事，確實需要兼及「歷史、傳說與精神」。本書的論述策略是：第一，注重歷史資料的發掘，第二，著意生活細節的勾勒，第三，強調教育規律的總結，第四，凸顯讀書人的心境與情懷，第五，引入國際視野以及當下的問題意識。若真能做到這五點，這個本就很精彩的「大學故事」，是能講好的。至於「緒言」的標題套用羅家倫《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——從遷校到發展》（初刊一九四一年《教育雜誌》，後收入《逝者如斯集》，台北：傳記文學出版社，一九六七年），只動一字，盡得風流，目的是向羅家倫等飽經憂患而奮鬥不息的前輩們致意。

本書第一、二章是經歷多次演講、不斷「演進」而成的；雖說匯集成書時，做了認真剪裁，還是帶有明顯的說話口氣。「演說腔」的殘留，多少影響文章的學術深度。但我不後悔。因為，當初現場聽眾的熱烈反應，已給了我很大鼓舞。某大學教授聽完演講，甚至建議我舉辦「巡迴演出」——不是因為我的表演格外出色，而是故事本身很動人，值得年輕一輩認真傾聽。

這就說到了圖像資料。每回成功的演講，精心準備的演示文稿（PPT）起了很大作用。尤其是「秀」出不少珍貴的歷史照片，給聽眾以意外驚喜，抵得上研究者的千言萬語。本書之所以限制篇幅，一個重要因素是為了方便配圖。不是所有的書籍都需要插圖，但此書非「左

「圖右史」不可。

僅以此小書，紀念偉大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。

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七日初稿，二月二十八日修訂於京西圓明園花園



一九四四年秋，西南聯大中文系教授歡送羅常培赴美講學



一九四六年五月西南聯大中文系師生合影

A detailed black and white woodblock-style illustration of a mountainous landscape. The scene is dominated by steep, craggy mountains with intricate line work depicting textures and shadows. A river flows through the center of the valley, with a small boat visible on its surface. The overall style is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, characterized by fine, expressive lines and a sense of depth and movement.

此情可待成追憶

——中國大學內遷的歷史、傳說與精神

一、炸不垮的中國大學

這是一場慘烈的戰爭。不管敘述框架大小，是十四年抗戰全景（一九三一—一九四五），還是八年全面抗戰（一九三七—一九四五），中國人民為反抗侵略而承受的犧牲，據近年的研究成果：傷亡約三千五百萬人，直接財產損失一千億美元以上，間接財產損失五千億美元^①。除了人口及經濟上的損失，這還是一場文化大劫難——毀滅了眾多圖書典籍、重要文物、古建築等，其中尤以各級學校的慘遭轟炸最為令人髮指^②。

面對強敵，中國政府在全力抵抗的同時，不得不以空間換時間，即所謂「苦撐待變」。因此，也就有了近乎不可能的大撤退——在有限的時間內，有條不紊地實現了政府內遷、工廠內遷、企業內遷、學校內遷、文物內遷等。如此大規模內遷，「衣冠西渡」，沒有喪失戰鬥意志，

① 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《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》第七五九頁，北京：中共黨史出版社，一九九五年；何理：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》第四五四頁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二〇〇五年。另外，抗日戰爭尚未結束，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韓啟桐編著《中國對日戰事損失之估計（一九三七—一九四三）》（上海：中華書局，一九四六年一月），分論人口傷亡、財產損失、資源喪失、其他負擔等，其中提及人口傷亡一千零七十五萬八千多。

② 參見孟國祥《大劫難——日本侵華對中國文化的破壞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二〇〇五年。

固然很不容易^①，而西南大後方「接納和安置了大批內遷的機關、工廠、學校和人口，保存和發展了抗戰力量」，同樣值得高度讚許^②。本文所講述的「中國大學內遷的歷史、傳說與精神」，必須放置在如此大背景下，才能看得清楚。

一九三七年夏天，戰爭全面爆發，日本飛機轟炸天津、南京時，居然選擇南開大學、中央大學等非軍事目標。一開始中國政府及新聞界還在抗議，很快明白了對方的思路：不是誤炸，而是有意為之，藉以打擊你的士氣，最大限度地製造恐慌情緒。某種意義上，炮火連天中，中國大學依舊弦歌不輟，這本身就意味着力量與勇氣，說明這個國家沒有屈服，還在頑強戰鬥，且對未來充滿信心。各大學內遷路線及最後立足地不同，但《西南聯合大學校歌》還是唱出了共同的心聲：「萬里長征，辭卻了五朝宮闕，暫駐足衡山湘水，又成離別。絕徼移栽楨乾質，九州遍灑黎元血。盡筋吹弦誦在山城，情彌切。」^③

① 參見蘇智良等編著《去大後方——中國抗戰內遷實錄》第八一—一六頁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二〇〇五年。

② 參見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、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編《抗戰時期的西南大後方》第十二章「西南大後方對抗日戰爭的貢獻」，北京出版社，一九九七年。

③ 《西南聯合大學校歌》，載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編《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》第一頁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一九九六年。